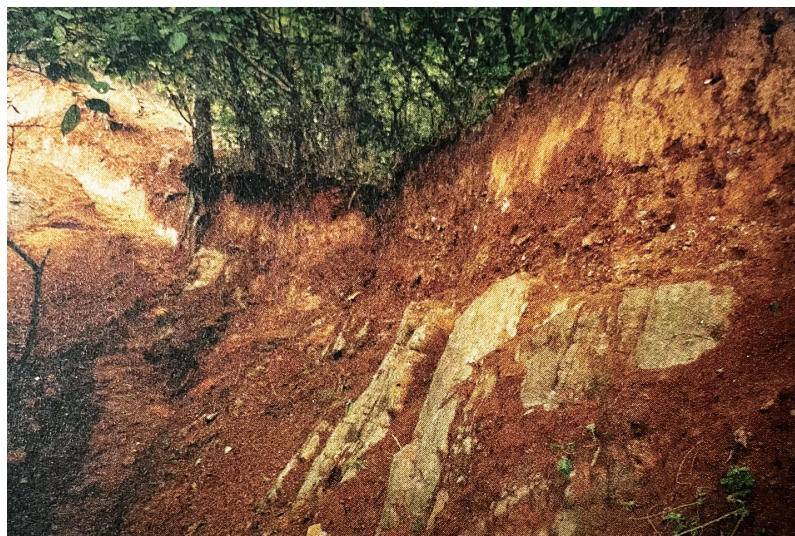


唐时润州二重城之罗城



唐代罗城虎头山段遗迹

□ 张剑 马彦如

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标志,也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独特视角。中国古代的府城通常有两道城墙:子城、罗城。

润州罗城即当时镇江城的外郭,规模较大,比子城扩大了几倍,主要向西、向南扩展。反映出镇江城市在唐代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居民人口大幅度增长,商业、手工业更加繁荣,从而在唐代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的地位日趋重要。

唐代修筑润州罗城志载有两次。

唐文宗大和年间(公元827—835年),时任浙江西道观察使兼润州刺史的王璠命人“凿润州外隍”“因沟其城,凿深数丈,役人得一方石,石铭十二字:‘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方石铭文经“京口老人”讲析,为王璠凶兆。《新唐书·王璠传》《太平广记》分别记载了王璠修筑润州城的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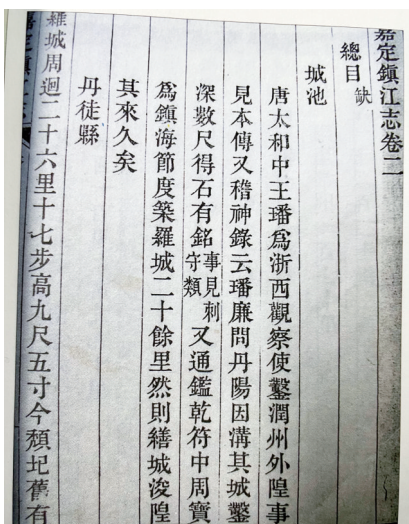
唐僖宗乾符年间,镇海节度使周宝在润州筑罗城作外郭。宋《嘉定镇江志》记载颇为具体,曰“罗城,周迴二十六里十七步,高九尺五寸,今颓圯”云云。在罗城的城门中,志载的鹤林、青阳二门唐代乾符年间确有其名。

《太平广记》卷七十记载: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到鹤林门时,挖掘出一座古墓,棺槨将腐,打开发现,有一女子人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腐朽。周宝亲自到现场视察,改葬送行时,棺内女子“坐于紫云,冉冉而上”。此事传闻颇具神话色彩,但周宝治城隍至鹤林门却是史实。鹤林门,在鹤林寺北侧,其北门至两宋时期仍存。

志载:周宝驻润州时,“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芙蓉楼又称“后楼”)。光启三年(887)二月,周宝因为兵变夜半惊起,“徒跣叩芙蓉门,呼后楼兵,后楼兵亦反矣!宝率家人步走出青阳门,遂奔常州”。可知青阳门于乾符年间亦已存在。

考古人员曾于1993年在市区阳彭山工地,1996年在铁瓮城东垣顶部和气象台山工地,1998年在塔山桥段,1999年在东岳巷段,2003年在北固山龙埂,2009年在沪宁城际铁路地段等地发现部分宋代罗城遗迹,基本确定了罗城的东、西、南方向的走向。

唐代润州罗城,周长二十六里十七步,比之明清镇江城,周长要大一倍,面积是其三倍有余。通过考古调查、发掘,并结合史籍有关记载,可以勾勒出润州城的粗略轮廓。罗城,以北固山南峰的子城为基点,东侧应包括花山湾古城的范围。在花山湾城垣考古中,曾发现有唐代加筑或修筑城垣的迹象,说明此城在唐代还继续



宋代《嘉定镇江志》记载唐代罗城史实

使用。循此向气象台——东门广场方向,经过古青阳门继续向南延伸。罗城的南垣东段,大致位于覆釜山、虎头山北侧,而南垣西段从鹤林寺北侧折向西北,北城垣亦从北固山南峰的子城向西,沿长江岸边,越京口闸。西城垣由京口闸外侧,向南经山巷一带过登云门(位于宝盖山北侧,至今地名依旧)、阳彭山、东岳庙巷,斜向东南,与鹤林门抱合。

1998年,考古人员在镇江老北门金通工地发现了明代定波门瓮城石垣,据考证当年城垣高约5米。同时在明代瓮城城垣南侧还有唐宋城门及城壕遗迹,说明此处即是唐宋罗城的定波门所在。史料记载:“其时,镇江府城城墙周长十二里许,高两丈六尺,城门有四:东朝阳,西金银,南虎踞,北定波。”

镇江市郊唐代墓葬的分布,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确定润州罗城范围的依据。唐墓在城东分布于北固山东侧,花山湾城垣及京岷山西侧一线,城南分布于覆釜山北边,城西南密集分布于李家大山、阳彭山西南、宝盖山东麓一线。出土的唐墓志中还反映出城郭周围的部分乡名和位置:唐时的李家大山称阿育王山,西部及宝盖山属万春乡,山之东侧则属竹里乡,城南覆釜山、黄鹤山一带称宝山乡。其中,有两方墓志具体标明墓地的地望在罗城外:一是徐巽墓志,内有“葬润州丹徒县郭西南阿育王山之西北原”的内容;另一方是荀夫人墓志,内有“于当州郭西万春乡阿育王山西南原”的文字,进一步表明了墓地与城郭之间的位置关系。

唐宋罗城总体地势比之铁瓮城和京口城已是平地为主,古城街衢随着大运河漕运的发展而繁荣,城内“民居商肆夹渠而列”,丁卯桥唐代金银窖藏的出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江(润州)彼时的繁华盛景。

《问道茅山三千年》②

张春蕾 夏和生



道教历史沿革

(一)春秋战国时期——道教之树耕耘播种

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战国时代的方仙道,两汉的黄老道,是道教信仰的起源。换句话说,鬼道、方仙道、黄老道乃是道教的母体,是早期道教的思想渊源或者说是道教的胚胎。此时只能算是一种准宗教信仰。

(二)东汉时期——道教之树破土而出

流行于战国时代的方仙道,到秦汉时逐渐没落,继之而起的是黄老道。继黄老道而兴起的则是东汉顺帝年间兴起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太平道及西南地区的五斗米道两大教团,主要流传于民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因其教义简单、组织单纯,被称为原始道教或早期道教。太平道创始人张角发动黄巾大起义失败,从此销声匿迹,太平道逐渐隐遁。五斗米道逐步成为道教主流。

甘忠可、于吉、张角、张道陵等人物都与道教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有经典、醮仪、规诫以及庞大的宗教组织,他的孙子张鲁后来雄居汉中20余年,在民间影响颇大。张鲁后又归顺曹魏,得封万户侯,使张道陵的声誉与影响俱超过前面3位,张道陵被后世推举为道教的创立者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此时道教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神学理论、教理教义,经典、教制以及组织均不统一,这一时期的道教一般被称作早期道教。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之树苗茁壮成长

葛洪、寇谦之、陆修静与陶弘景等高道名士对早期道教进行了改造和充实,道教的教理教义、修持方术渐趋完备,原来流行于民间的道教完成了理论化、体系化与上层化的蜕变,从江湖之远登上了庙堂之高。

葛洪的《抱朴子》是早期道教神仙信仰的集大成之作。北朝寇谦之对五斗米道的改革形成了北天师道,南朝陆修静的改革形成南天师道,南北天师道的形成,标志着对原始的民间五斗米道进行改造充实提高的完成。从寇谦之开始,道教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承认,成为官方宗教。

茅山上清派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这是道教中新出现的一个派别,创始人是魏华存、杨羲等,信奉元始天尊等神灵,以《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为主要经典,存神、思神、诵经、服气与咽液是其主要修持方术。

(四)隋唐北宋时期——道教之树枝繁叶茂

李唐皇帝自认太上老君李耳是自己的族祖,故认为道教是皇族的宗教,把道教列为儒释道三教之首,唐玄宗时道教已近似于国教。该时期

的道教可用“鼎盛”“高涨”等词来形容,道士的社会地位高,高道被诏请入宫,询问政事,讲道说法;信徒人数不断增多;宫观遍布全国;道教的经典图书也日益增多,并汇编成《道藏》。

北宋皇室幻想借神威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所以延续唐以来的崇道政策。宋真宗为自己制造了一位道教祖宗“圣祖赵玄朗”;宋徽宗求得了“教主道君皇帝”封号,把道教与政权直接结合在一起,把道教抬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水浒传》开篇第一回便是“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梁山好汉坐第四把交椅的是紫虚观道士人云龙公孙胜,他和他的师傅罗真人小说中被写得能呼风唤雨、出神入化,正是那个时代最崇尚的本领。

由于唐、宋文化思想的灿烂发展以及佛道斗争的需要,唐朝与宋朝都编辑了《道藏》,司马承祯等高道均著书立说,道教在思想教义、修持方术和科仪制度方面都向前进了一大步。

(五)南宋金元时期——道教之树再发新枝

南宋金元时期,华北出现了全真、太一、真大道等新道派,特别是全真派的出现,道教之树再发新枝。

全真的意思是“全其本真”,即保全作为人生命之根本的精、气、神三要素,使其不受污染、亏损。全真道是北宋以后最重要的道派之一,教义修持方面主张“三教圆融”,要求信徒读《道德经》《清静经》《心经》《孝经》。修持方面,反对炼养外丹和符箓驱鬼之术,主张炼养内丹,性命双修,从追求肉体长生不死、飞升上天,转变为精神超越长存而形体不离凡间。

(六)明清民国时期——道教之树逐渐枯萎

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道教发展总体陷入停滞僵化阶段。明成祖时武当道兴盛,张三丰、张宇初、陆西星是明代的著名高道,真武大帝的信仰得到强化。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是迄今唯一保存完好的道教经书全集。

民国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与修持方术渗透民间,道教文化浸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基督教借助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强势传教,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道教逐渐丧失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主流地位,但道教仍然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风俗民情。

(七)新中国时期——道教之树枯木逢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宗教信仰政策的保护下,中国道教协会于1957年在北京成立。道教宫观的建设、道教人才的培养、道教慈善事业、道教文化研究、道教文化对外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道教在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今全国有1万多处道教宫观,道士4万多人,古老的道教顺应时势,正在走向复兴。